

徐铎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他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徐铎:一生只做一件事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记者手记

衣冠简朴古风存

一辆购于1973年的28自行车,徐铎从四川骑到了北京,原子能院不是没有考虑过为他配一辆小车,但他总是婉言谢绝。一套普通的西装,一身工作服,徐铎穿着它们应付各种会议场合与日常工作,以不变应万变。

质朴的情感。“人和人应该是很和谐的关系,互相体谅。”最近徐铎在搬家,工人师傅觉得这个精神矍铄的老科学家很是“神圣”,但徐铎却对他们说:“你们只是没机会念那么多书,要是有机会,你们做得肯定比我好。”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记者注意到徐铎的手指头破了,一块略有些发黑的创口贴贴在右手大拇指上,联想到他因为血压高,每天都得吃药,不禁好奇他的伤从何而来。

与徐铎共事多年的“快堆”工程部经理、副总工程师喻宏说,徐铎每次出差回到单位,都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写的总结报告扫描成电子版发给大家,细到每个参会人员一问一答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就像是一台录音机”。

“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弄伤了。”徐铎笑着说,他的妻子年纪也不小了,尽管两人身体都不算太好,做起家务来总是身体力行。

“人和人之间就应该有着更多和谐的正能量。”徐铎说自己没有任何资格炫耀,他总是把别人放得很高,把自己放得很低。或许,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教育世家的徐铎,正保留着中国最朴素的传统美德。

原子能院外就是农村,每次买菜,同事们都会注意到徐铎总是优先光顾老年人的摊位,而且从不还价。对他们,徐铎保有很

书时,还有些不大乐意。但父亲告诉他,核工业是国防工程,“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强大,你应该去学”。

这个简单的信念,如同种子一般种在徐铎心里,生根发芽。

1961年大学毕业后,徐铎进入北京原子能所(原子能院的前身)工作,当时相关工作属于保密的范畴。在徐铎的印象中,父亲始终没有过问过一句关于工作的事,父亲相信在他几十年的言传身教之后,已经不需要再对徐铎说些什么。

徐铎说自己忘不了初到原子能所时钱三强所长的一次报告会,他对着台下懵懂的年轻人说:“你们这些新同志,5年内一定要成长为能领导师弟师妹的人才,10年就必须全面搞懂这个专业,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在这里继续工作。”

徐铎听完后感压力很大,在随后的日子里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这个要求,他更刻苦了。住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徐铎和舍友们极少早归,每天的话题总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份执著延续到今天,未曾改变。

这样的日子单调吗?徐铎对记者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他直言自己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相关研究始于1965年。48年间,中国自主完成了“快堆”概念设计、初步设计、施工设计以及建筑、安装调试工作。徐铎说,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的守候心态。

1965年,徐铎正式加入“快堆”研究。他清晰地记得提出“快堆”概念的美国物理学家、反应堆之父费米于上世纪40年代说过的两句话:“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会建增殖堆的国家,将永远解决其能源问题。”

1937年,徐铎出生在扬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年抗日战争爆发,徐铎的父亲原本是搞化学的,由于担心受日本人逼迫去制造炸药而改行教了数学。若干年后,当时痴迷于数学不可自拔的徐铎收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

“这点燃了徐铎的热情。1970年,“快堆”的零功率装置在原子能所建成,临界实验也随后成功进行,但命运的吊诡就在此时演绎在了徐铎和“快堆”上。”

徐铎有很多机会跳槽,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其他研究机构都曾向他抛去橄榄枝,但都被他一——谢绝。“你个人或许能有更好的前途,但你的专业大多时候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国家辛辛苦苦培养你,不是为了让你个人能挣大钱,有好的前途。”面对记者,76岁的徐铎眼中流露的更多的是坦诚与直率。

原子能院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也很喜欢这个说话没有架子的老人,不时找他聊工作,有时也谈到个人前途,徐铎总是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回答:“你学什么专业,今后就做什么,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当年当选的“最老”院士

1986年我国启动了“863”计划,为了让国家了解“快堆”的重要性,徐铎只身北上,凭着个人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对“快堆”战略规划的认识,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快堆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外的“快堆”发展情况,得到了专家们的支持,此行直接推动了国家相关部门将“快堆”纳入“863”计划。

沉寂了16年后,徐铎和“快堆”终于得以走出大山——当时他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在“快堆”事业中度过了自己整个青年时代。

重回北京后的徐铎,依旧是在科研中坚守,直到20多年后“快堆”临界、并网发电的那一刻。

2011年中国工程院遴选院士,原子能院的同事们觉得徐铎挺有希望的,但徐铎却摆摆手说自己已经太老了——2011年的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规定,相关候选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70岁,而那一年徐铎已经74岁了。

他并非没有机会,因为在政策中还注明,年龄超过70周岁的被提名人,须经其专业所属学部至少6位院士提名,即可有效。

有6位院士的联合提名——这已经是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肯定,而且在“快堆”临界、并网发电之前,你能找到的关于徐铎的信息少得可怜。

面对这个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徐铎说当时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念头,比如“要诚实,要实事求是”。“‘快堆’建成了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我就写一笔,其他的绝不多加。”

虽然担任“快堆”项目总工程师30余年,但他极少为个人荣誉而报奖,以至于那张院士候选人提名书的初稿中,报奖一栏全是空着的。同事急在心里,觉得这样选不上院士了,建议他多写一些成就,但徐铎还是坚持己见,有什么就写什么。

“我当时心里没什么底,只是想写别把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写上了,就算因为写得很多而当选了院士,之后我也不安心。”2011年底,徐铎正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也是当年新当选院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回忆那段日子,徐铎却说成为院士后压力更大了,他觉得更多的时候院士的荣誉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他甚至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起来,徐铎说自己从不对自己不懂的领域随便发言,他认为,“讲话应当慎重,尤其不要对别人的领域说三道四,科学技术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当了院士后,外面的任务也多了起来,有时徐铎也要帮助评审一些文章,但他还是坚持一个理念:永远把“快堆”相关工作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领域研究好了,心里才最踏实”。

简单与不变

尽管已经年过七旬,但无论寒冬酷暑,只要不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原子能院的同事们总能看到他白发苍苍的徐铎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院内,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总会笑眯眯地为你排忧解难。还有的时候,电话里几句没讲清,徐铎会说:“请稍等一下。”几分钟后,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指导具体操作步骤。

拜访徐铎的当天,正赶上他在为国防科工局即将对“快堆”的验收工作做准备。

回顾工作之外,徐铎觉得自己还能再发挥些余热,“快堆”虽然暂时停了下来,但他仍在考虑着运行时的安全问题,“年纪大了,心思总是放在这些方面”。一有机会他就向别人提点建议。

这份简单与不变的信仰,亦感动了中国。2011年至2012年,媒体密集报道了徐铎的故事,一时间掀起学习徐铎精神的热潮。

身处其中的徐铎尽管有些应接不暇,但始终对每一个来访的记者保持微笑,有问必答。

原子能院新闻中心采访部主任李焱雄回忆道:2012年2月初,她陪同徐铎参加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录制,那天天气特别冷,为了配合录制,徐铎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一直从早上10点录制到了下午2点,尽管连午饭都没吃上,但谈起“快堆”,徐铎总是显得那样地耐心。录制结束后李焱雄问徐铎累不累,徐铎却说:“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要做就要做好。”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老人,为解决技术难题一次次爬上20层楼高的脚手架,在工程完成后的调试阶段多次连续指挥调试不休息,在‘快堆’临界、并网发电前后的日子里,没有请过一天假。”李焱雄说。

最近18年间,徐铎只请过一次假——就是在“快堆”临界后请了10天左右的探亲假。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休年假时——那可有15天,他却一脸诧异:“年假有这么长啊?”

2010年7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纪念建党89周年、迎接建院60周年表彰先进大会上,授予徐铎等5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突出贡献奖”,每人奖励10万元。

徐铎将这1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徐铎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徐铎的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对徐铎来说,与同1965年那个对“快堆”一身热血的青年相比,现在的自己却终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念头:“信仰,就是要为国家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Opinion 记者眼

单霁翔:故宫禁烟

5月18日是第37个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高调宣布,将在全世界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北京故宫实行全面戒烟。“紫禁城建成近600年来首次全面禁烟。”单霁翔说。



过去的两年里,由于失窃、错字、会所等一系列负面事件,故宫深陷“十重门”。而2012年1月起走上任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单霁翔此前提出在8年内建设“平安故宫”,或许可以视为他的某种宣言。建设“无烟”紫禁城,单霁翔的对像是先管好“自己人”:员工吸烟扣部门半年奖金,同时力邀媒体随时监督。

良药苦口利于病,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院,如果真能动真格、下狠招,那么对全国的博物馆、景区来说都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毕竟经过一系列的负面事件,信任已是故宫所不能承受之重。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畅销书作者霍金近日决定,为响应巴勒斯坦学术界号召,取消今年6月前往以色列出席一场名为“总统会议”的高端学术会议计划。该会议由以色列总统佩雷斯主办,会后还有佩雷斯90岁生日的庆祝活动。

霍金:人文关怀

持续多年的巴以冲突,受伤害的更多是平民,仅以色列在2008年底的“铸铅行动”,就造成了313名儿童和116名妇女死亡。霍金抵制会议,可谓有理有据。



对我们来说,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事件往往更受关注,但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巴以交界区,仍游荡着千余亡灵。同样是生命,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

尽管霍金研究的目光依旧停留在宇宙之外那些似乎与尘世无关的事物上,但他的举动无不透出某种人文关怀: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有时也应该把目光拉回现实,关注周围的人正在遭受的最真切、平凡苦难。

“陈某”:道德困境

5月18日,武汉一大学生“陈某”骑自行车撞倒82岁的老人,老人因手腕骨折需要住院,面对千元医疗费,激动之下陈某持刀劫持了一位女医生。经过几个小时的对峙,陈某终于被警方擒获。



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当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引用“路边社”消息报道称“家属索赔30万”时,我们或许下意识地将这起事件同几年前的“彭宇案”联系起来。当时,以该案为代表的老人“碰瓷”事件,让公众的道德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尽管事后警方证明家属索赔30万纯属讹传,大学生陈某也承认自己的反应太过激烈,但对事件之外的我们来说,似乎又加深了某种“逃避责任”式的心理预设:人们不更加担心自己的善念会落入陷阱中,即使不是,也容易陷入某种“麻烦”的境地。毕竟,道德不设法庭。相关部门、媒体、当事人在处理事件时是否应有更多考量?

否则,这样的“负能量”累积起来,道德人心不知将被带往何方。

“滥用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其后果是毁灭性的!”美国《科学》杂志总编布鲁斯·阿尔伯特在近日发表的社论中呼吁,停止使用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判科学家的个人工作。该言论得到了全球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75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响应。

布鲁斯:科学起义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美国ISI(科学信息研究所)的JCR(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一项数据。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设立这项数据的本意,是帮助图书馆决定订购哪些期刊,但在某种功利主义的前提之下,它却被广泛用于评价研究机构和个人的绩效,给很多科学家带来了困扰,不少中国科学家也深受其害。

一位参与此次行动的学者将行动形容为“科学起义”,这启示了我们:对身边的不合理现象,科学家更应该联合起来说“不”,让一切回归科学本质。(吴益超)



中国实验快堆反应堆大厅(资料照片)。